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巴蜀书社



0034740

译注 刘文忠

审阅 董治安

吕氏春秋选译

566994



2 031 0373 8

吕氏春秋选注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梅锦辉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吕氏春秋选译

刘文忠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8.125 字数120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 价：140.00 元(第二批50种)

609/10/17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吕氏春秋》是先秦时代的一部重要典籍，它是在秦相国吕不韦主持下，由他的宾客门下集体编撰而成，其指导思想与吕不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前265），昭襄王立其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虽有子二十余人，但他宠幸的华阳夫人无子，而庶出的公子楚，因其母夏姬不受宠幸，被派往赵国做“质子”（人质）。秦国数次攻伐赵国，赵国因此对子楚很不礼貌，子楚陷入困难的处境。吕不韦本是阳翟富商，正好此时在赵都邯郸遇到子楚，以子楚为奇货可居，于是出千金而西入秦，通过多方活动，使子楚立为华阳夫人的嫡嗣。从此吕不韦弃商从政，与嬴秦王朝结下了不解之缘。

子楚即位后，称为庄襄王。庄襄王元年（前249）立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便死去了，十三岁的太子嬴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为“仲父”。《吕氏春秋》的编撰约始于此时。《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据《序意》篇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高诱注说：“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但《汉书·天文志》说：“太岁在申曰涒滩。”而秦始皇即位第八个年头是“壬戌”，不是申年，这里发生了太岁纪年与干支纪年不一致的问题。依清代学者考证所谓“维秦八年”是从庄襄王灭周第二年（癸丑）算起的，吕不韦所以要从这年起算，可能是受了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周以火德王，秦以水德胜，所以纪年从水德代火之年算起。这样看来，《吕氏春秋》的成书当在始皇六年（前241）。

《吕氏春秋》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览”、“六论”计一百五十九篇，加上作为序文的《序意》篇，共一百六十篇。它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哲学、政治、历史、科学、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可以说是先秦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从佐政的角度看，又像一部“资治通鉴”，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备于一书。书成之后，吕不韦曾把它“布

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由于吕不韦在政治主张与治国方针方面与秦始皇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因此秦始皇在亲政后的第二年（始皇十年），便借故免去了吕不韦的丞相职务，令他回到河南封地去。当时六国诸侯多与吕不韦交通，秦始皇怕他作乱，于是两年之后又将他徙居蜀地。始皇十三年（前234），吕不韦在赴蜀途中自杀。看来司马迁所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是靠不住的。有的研究者主张：始皇六年成书的是“十二纪”，“八览”、“六论”为迁蜀之后更令宾客完成，这只能是个推断，证据尚嫌不足。

《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列入“杂家”一类。从它综合百家九流、畅论天地人物看，称它为“杂家”是对的；从哲学思想上看，也可证明它具有杂家色彩。在对宇宙本体“道”的认识上，它兼采了儒道二家的学说。

老子提出“道”是宇宙的本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但老子又认为“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这就是说他所谓的“道”是没有任何物质属性的虚无。《吕氏春秋》

认为宇宙的本原出自“太一”，这个“太一”也可称作“道”，《大乐》篇说：“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这与《易传》所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分阴分阳，递用柔刚”等有些相近。什么是“道”呢？《吕氏春秋》说：“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

（《大乐》）这又与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二十五章》）口吻是一致的。但它又提出“道”不是虚无，而是一种具有物质属性的“精气”^①，它扬弃了老子“道”的唯心主义成分，对老子的“道”有所改造。《吕氏春秋》在天道观上也具有素朴的唯物主义性质，它认为天地是由“精气”形成的，精气中的轻扬者上升而成为天，重浊者下沉而成为地。在《尽数》篇中，它认为鸟兽、珠玉、树木等都是精气聚集而入于外物的表现，它把自然界的千品万汇当作精气的外化，“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因）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它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由精气的运动和变

化所形成的，这样天或宇宙便是由物质构成的自然界了，在这一点上，它又受了荀子“天道自然”的影响，而与其他各家不同。《吕氏春秋》不相信鬼神，不承认天命，在《尽数》篇中说：“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疫病愈来。”它认为人的疫病是精气郁结而成，求神问卜是无济于事的。它对命的解释是：“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举错者，不得与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知分》篇）它把命看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没有把命运的主宰看成是上天，这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运动观上，《吕氏春秋》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不断地运动，而精气的离合就是自然界运动的原动力和规律。《大乐》中说：“浑浑沌沌，离而复合，合而复离，是谓天常。”这说明它认为就连天地也是从精气离合的不断运动中产生的。《尽数》中又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蝼。”《达郁》中还指出：“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故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草郁则为蕘。”这原说明它很重视和强调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万事万物都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继续保持长久。它的这些论述都表露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它又认为天地万物的运动是周而复始的：“天地车轮，终则复

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大乐》篇）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它还把阴阳家的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的五行学说，运用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用以解释社会的演变和朝代的更替。虽然在《察今》篇中提出古今时势不同，“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透露出关于社会进化思想的信息，但从根本上说，《吕氏春秋》还没有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局限。

《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是比较系统的，它提出了一套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以仁政德治为核心，并辅之以赏罚的治国方略。仁政德治和民本思想是儒家的政治主张，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和“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思想都为《吕氏春秋》所吸收并从而形成自己的体系。《吕氏春秋》反对家天下，主张至公无私是为君的先决条件，它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篇）在《去私》篇中又说：“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反对家天下必然讴歌禅让，《圉道》篇指出：“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继承人），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公正）。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

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以上这些主张，显然与儒家“天下为公”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这与《吕氏春秋》的主张，是十分相近的。

《吕氏春秋》从历史的经验中认识到，民众乃是国家的根本，而能否得民心，是能否使天下长治久安的决定因素。它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顺民》篇）可是要获得民心，就必须切切实实的为人民谋福利。《适威》篇云：“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它还在《精通》中强调指出：“德也者，万民之幸也。”它特别把“行德爱人”作为德治的核心和治国的指导思想：“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爱士》）又说：“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爱类》篇）这与孔子主张的“仁者爱人”是相通的。我们知道，秦自孝公以来就推行法家路线。

《吕氏春秋》的德治方针，与法家思想是针锋相对的。《吕氏春秋》也讲赏罚，但只把赏罚当作一种辅助手段，与法家主张的严刑峻法有根本的不同。它说：“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用民》篇）它反对凭君主主观的爱恶而施行赏罚，主张赏罚的标准应当是义（见《义赏》篇）；它还认为赏罚不能滥施，不可专恃，而要适可而止。“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用民》篇）并认为“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上德》篇）这与法家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

在《吕氏春秋》的德治思想中，教育与音乐占有突出的地位。它对教学十分重视，对教师特别尊重。《尊师》篇说：“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它还列举了尊师的具体做法，给做教师的人以崇高的地位。《吕氏春秋》十分注意音乐的作用。《适音》篇说：“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这与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所持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甚至在语言口吻上也大同小异。

《吕氏春秋》主张“君主无为”，它说：“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当染》篇）它在许多篇章中，反复强调君主不要陷于具体事务中，要执守无为，甚至主张君主的本分与职责是“无智、无能、无为”，因为只有君主“无智”，才能使众人“有智”，只有君主“无能”，才能使众人“有能”（见《分职》篇）。它所理想的“君道”是“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君守》篇）一位贤明的君主要“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这些主张显然与秦始皇的强力躬行的施政方针和独裁统治是相对立的。儒家主张“垂拱而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虽以儒家为主导，但在君道方面则颇近于道家。

《吕氏春秋》的战争思想也很值得注意，它不像墨子那样反对攻击性战争（见《墨子·非攻》），对于“攻无道而伐不义”（《振乱》篇）的战争，它是赞成的。它认为战争双方的攻击与救守并无关紧要，关键要看战争的性质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它还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战争的性质和人在战争中的智慧和勇敢；同时

承认武器装备是否精良也是重要的因素，它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是较正确而全面的。

此外，《吕氏春秋》还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它保存了不少为《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所不载的史料。在科学技术方面，它保存了古代许多医农方面的知识，它有较完整的一套“养生”理论，要求人们在饮食、情欲方面要有所节制，它说：“肥肉厚酒，务以自彊；命之曰烂肠之食。”

（《本生》）又说：“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情欲》）它把“靡曼皓齿，郑卫之音”称作“伐性之斧”（《本生》），从“全性之道”出发，对于“声色滋味”，它主张“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本生》）它认为人的精神郁结就会招致疫病，提倡运动，反对一味追求安逸舒适，“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它在卫生医学方面的许多观点，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吕氏春秋》十分重视农业和农业生产技术。

《贵当》篇说：“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上农》篇则较系统地论述了重农思想。它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并进而论述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种种好处，把重农思想提高到政治方略上加以认识。在《任地》、《辨土》、《审